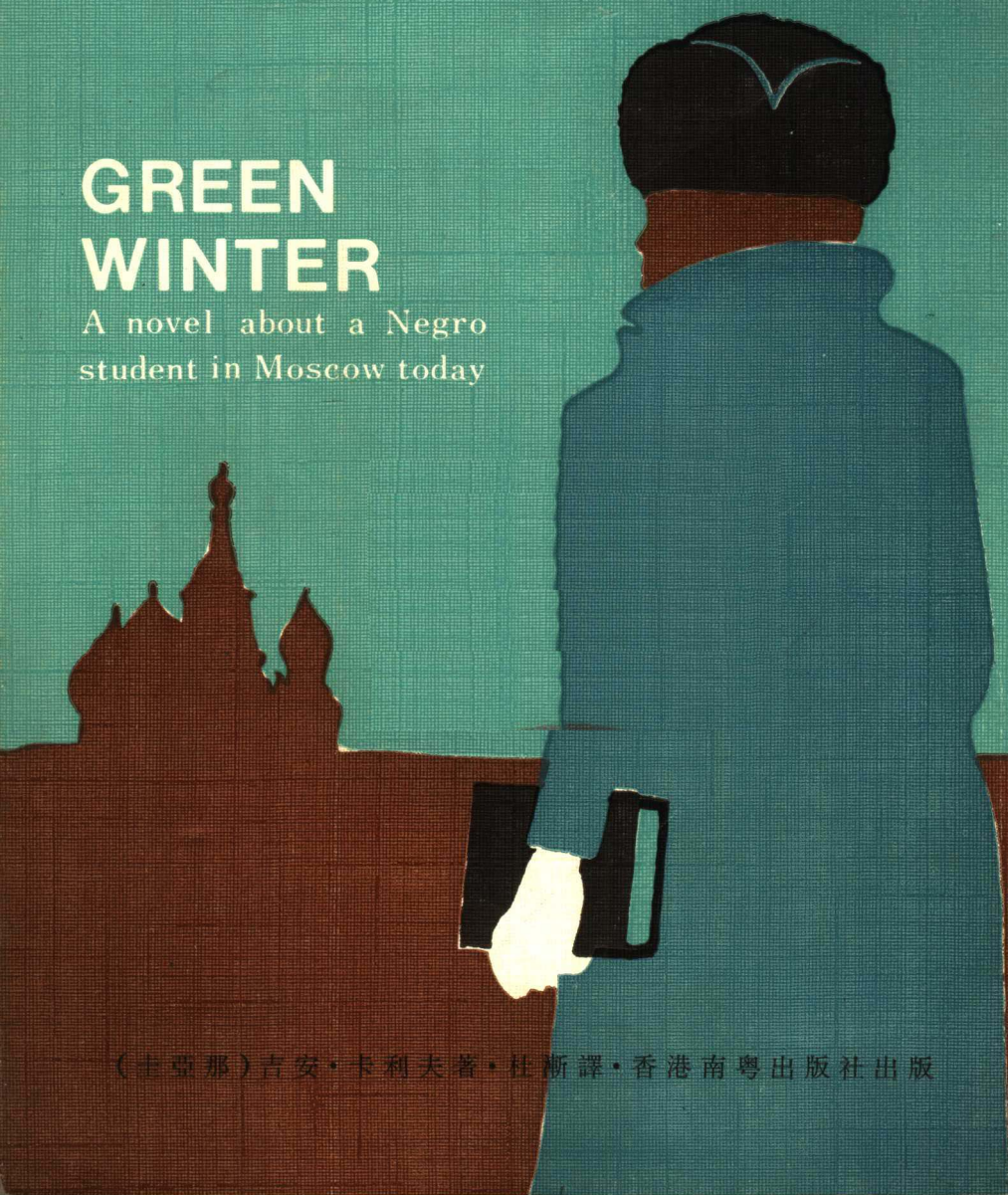


青色的冬天

— 莫斯科留學記 —

GREEN WINTER

A novel about a Negro
student in Moscow today



(主亞那)吉安·卡利夫著·杜漸譯·香港南粵出版社出版

GREEN WINTER

A novel about a Negro student in Moscow today

青 色 的 冬 天

—— 莫斯科留學記 ——

(圭亞那) 吉安·卡利夫著·杜漸譯·香港南粵出版社出版

青色的冬天

——莫斯科留學記

(圭亞那)吉安·卡利夫著 杜漸譯

出版：南 粵 出 版 社

香港北角馬寶道六十六號二樓

印刷：大 千 印 刷 公 司

香港九龍炮仗街七十五號

一九七七年二月初版

一九七七年八月第二次印刷

每冊港幣四元六角

印度對華戰爭

內維爾·馬克斯韋爾著
定價港幣十四元

本書作者為澳大利亞人，曾在加拿大麥基爾大學和英國劍橋大學讀書。一九五五年進入《泰晤士報》當外交記者。一九五九年後，他任該報駐南亞記者，常駐新德里。當時正值中印邊界爭端日益激化和印度對華戰爭爆發的前後，在此期間，他同印度軍政官員接觸甚廣，對當時印度形勢的發展和中印邊界爭端有過不少報道。本書是他在一九六七年回到倫敦後寫成。內容回顧了中印邊界爭端的歷史演變，報道了印度如何走上與中國對撞的道路及其失敗的全過程，最後還敘述了停火後印度局勢的變化。全書三十多萬字，並附有地圖八幅。

斯諾著作中譯本

：我在舊中國十三年

三·〇〇

西行漫記

(全)

三·〇〇

大河彼岸

三·〇〇

漫長的革命

(增譯本)

八·〇〇

「你們現在是在蘇聯領土的上空了，從現在開始，你們必須遵守蘇維埃的法律，」空中小姐正在向大家報告。

她個子長得不高，身材很粗，有着一對警惕的棕色眼睛。我真想對這位空姐說，我能在蘇聯領空上飛行，是多麼興奮啊，我真想讓她也分享我這份歡樂，可是她却帶着一副既溫柔而又神祕的笑容，對我不理不睬，徑自從過道上走過去了。跟我同機有三個非洲學生，其中有一個正打機窗往外張望，說：

「我什麼也看不見。」

「讓我來看看吧！」我講得那樣熱切，使得同機的搭客都回過頭來望了望我。窗外實在沒什麼可看的，下邊是一片雲海，雲像一座森林似的，銀灰色的巨大的雲樹頂尖，聳立在這天上的花園裏。

我已經是在俄國上空飛行，我簡直不敢相信這是事實。這個禁止人們逾越雷池半步的國家，在我心目中是閃耀着紅光，那麼多姿多彩，長久以來就使我的想像充滿了驚惶和甜蜜的幻想。而

現在，我是在飛往莫斯科去的旅途中。俄國人給了我一份獎學金，我呢，希望能去學機械，學文學，或者學經濟——我也說不上到底會讓我學什麼。我今早從倫敦起飛，因為加油，在布拉格停了停，現在快要飛到莫斯科了。另外四個本來跟我一塊到蘇聯求學的英屬圭亞那學生，都臨時變了卦，其中一個設法搞到了倫敦郡議會的助學金，改進倫敦大學讀書，其他幾個則裹足不前。那個給我們辦妥護照、機票和答應關照蘇聯官方接受我們的中間人貝萊克先生，曾吩咐過我，得在兩天內做好一切動身準備。

有關獎學金的消息，我曾經等待了好幾個月，最後已經不再期望了，這時貝萊克却給我掛來了電話。

「獎學金已經搞妥了。」他說：「你得在兩天內做好動身準備。」

「這樣倉促，我可辦不到呀，我是在做工，我還沒搞到足夠的錢，甚至連這個禮拜洗衣的賬還未還清呢，至少得給我一個禮拜才行呀。」

電話那邊的聲音却像鑽石一樣，又冷又硬。不錯，他是在給我一個到世界上最偉大的國家去的機會，而我却在囉囉嗦嗦，盡講什麼錢呀、髒衣服呀。他開始教訓起我來了。他很清楚知道我心切要得到這份獎學金，所以他說什麼我都得低聲下氣地去聽。

「這就是我們的人去不了任何地方的原因了，我們缺乏紀律性。看吧，整個俄國的國家機器是不會停下來，等你賺夠錢去洗乾淨衣服的，你還要那一大堆衣服幹什麼呢？你去的國家並不是只敬羅衣不敬人的……」

「好吧，我在兩天內準備好就是了，貝萊克先生。」我明知他這個人是不喜歡人叫他「先生」

的，我也了解我這個初接受思想教育的人是應該稱他爲「同志」的，但他並沒有理會這個錯誤，繼續說下去：「另外，我要你說服其他那四位仁兄也一塊去。」

「好的，同志，我會照辦。」

「明天早上打電話給我……九點鐘以前……你得跟我去跑一趟蘇聯大使館。」

「同志，我會照你吩咐那樣，九點鐘以前打電話給你的。」

那天晚上，我在天使廣場附近的一間細小的臥室兼客廳中跟那四位仁兄見了面，那是一間又小又暗的房間，貼着水漬斑斑的黃牆紙。我們幾個是碰上好運有機會衝出倫敦獸窟的畜牲，但他們反倒覺得留在這藏身之所更爲安全，辦妥獎學金的消息並不使他們驚喜，相反，他們都吵吵嚷嚷對我說：

「……喂，莫斯科是個很遙遠的地方啊……我們在那兒人地生疏，鬼都不認識一個……貝萊克同志誇誇其談他那種共產主義的一套，當然容易啦……但他有沒有去過莫斯科呢？沒有！先生，他就坐在這兒，幹那份事閑錢多的工作，却把我們送到那兒去受苦受難……」

「可你們說過，你們想去讀書，想去增長你們的知識呀，」我內心憤慨起來，真想揪住他們，一掌把他們的頭揍扁。「我要讀書，就是到天涯海角去我也幹，我已經在倫敦呆了六年長啦……我最初來時想半工半讀……可白天的工作耗光了我身體的力氣，晚上的課程又傷透了我的腦筋，我頂不住，只好放棄了學習。就是過去的五年中，我都是個美國式的革命者，講了一大堆，參加了示威遊行，可哪兒也去不成……」

我從他們的眼中看出，我強迫他們也是白搭的，他們四個早已聯成一氣，討論過這計劃了。

這時他們流露出內心的驚懼、顧慮和那種農民式的猜疑，他們早已決定：反對到莫斯科去冒險。他們當中有一個自動站起來作代表，說：

「喂，那地方很遙遠，」無可否認，不只是在倫敦，甚至遠至我們的國家英屬圭亞那的村鎮，河澤和森林，對於莫斯科，都是有着爭論的。我會打算過要清醒和有分量地跟他們爭論。在國內搞地下工作時，我的觀點就會被人一個個地批駁得百孔千瘡，像瑞士的乳酪似的，使我又氣又惱。貝萊克會暗示過，如果他們不去，那整件事就會吹掉。我直望着他們那伙的發言人說：

「我要去，你們全都不願去，算了，我們都去見貝萊克好了。」

他猶豫了一下，我就將他一軍：「你怕不怕貝萊克呢？你怕吧？」

「我怕他？怕貝萊克？喂，這兒可是個自由國家，貝萊克再多也只不過能罵我們幾聲『帝國主義』特務罷了……他槍斃不了我們的……」

「那麼你們去見他嗎？」

「好吧，我們都去就是了。」他走過來，用拳頭撞了一下我的肩背，「別那麼認真，祖祖。」他常常會用過分戲劇化的詞句和動作，來掩飾自己的情緒，「這方面我早就懂得了，小伙子，不論是在天堂還是地獄……莫斯科還是倫敦、巴黎或紐約，沒有一個城市會有一種魔術的肥皂，能把一個黑人洗白的……因此，去莫斯科，你只會落得更大的失望罷了。」

對於這問題，我在地下工作時也會跟人爭論過的。

「那些英國佬踢我們屁股踢了三百年，所以我準備好了，去看看俄國人像什麼樣的，我知道俄國人比較好些……」

「祖祖，他們不會好多少的……英國人踢我們屁股，呃？不過我們已經學會如何迴避這些踢打，和如何進行反擊了……可俄國佬的踢打，我們却還弄不清是怎麼回事，因此要迴避他們就更加困難。」

我的名字叫祖瑟夫·羅伯遜，不過每一個人都叫我祖祖。我說每一個人，不過貝萊克可是除外的，他跟我講話時，壓根兒就不叫我任何名字。貝萊克並不算強迫別人接受俄國人的獎學金，相反，他鎮定如常，而且高高興興的，將惡毒的意圖用嘲弄的空談掩藏起來。當他發現自己無能爲力了，就大發雷霆。那幾個小伙子，本來是因爲使他這樣失望而感到有點內疚的，但見他這樣發脾氣，也就反唇相譏，惡語相向了。

貝萊克是一個頗爲正直但却完全缺乏獨立思考能力的人。如果他的共產黨上級命令他跨出懸崖去，他準會在他那套馬克思主義講義中找出適當的口號來說服自己，服從命令，大步操向泯滅中去的。

要完全理解我爲什麼到莫斯科去求學，就必須先了解貝萊克，因爲他曾在我的生活中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，甚至比他自己可能想像的更爲重要。貝萊克跟我一樣，也是西印度羣島的人，來自一個多種語言、種族、膚色和信仰的國家。貝萊克是個沒有歷史，沒有過去的人物，是一個從遺忘的世紀中東歪西倒地走出來的殖民地人民，他以一種足以使早期基督徒爲之慚愧失色的熱情，擁抱共產主義。他是個不明不白的人物——半受教育，半開化，半文明。從虛無中出來，他的背景是沒有根基、沒有身份的，他執着於新的信仰，爲了能感到有根據些，他總是去改變別人的思想，以排除他自己內心的某些頑固性和原始的恐懼。因此他就來改造我和我的一些朋友的思想，

我們沒一個人喜歡他的，但我們全都尊重他。有時聽他裝腔作勢地講他的那種馬克思主義的老生常談時，我就有一種很不自在的感覺，覺得他確是很聰明地在閹割着，他將馬克思主義信仰的肉體咬住不放，但馬克思主義的生命却不知怎的避開了他。不過在他對自己的信仰狂熱盲信的執着中，倒有着某種吸引人的地方，這在他的人格中是並不多見的。

有一晚有個朋友對我說：

「走，去結識一個共產黨員，」他說話的那個樣子，就像拉我到動物園去看一隻珍奇動物標本不公開的展覽似的。

我說：「我不想結識任何共產黨員，一去又得聽一大堆政治性談話了。」

「去吧，聽聽那人演說，他可是有點東西講的呢，」他堅持着說，我只好同意去見他那共產黨員。這就是我第一次認識貝萊克的情況。我還期望他會以熱情如火的革命真理來燒焦我的頭髮，可是却發現他那副尊容活像果戈理小說中的人物，既不高也不矮，既不肥也不瘦，既不老也不少，另外再加上既不黑也不白。那晚他只談過一次政治，那還是回答我問他的某些問題時，他才滔滔不絕地講出加勒比地區貧困的數字來，他頭腦中有的是事實和數據，足以使電腦都爲之失色的。但我和他接近，却並不是因爲他的意識形態跟我有什麼相近之處，而只是由於居住的情況。我原先的那個房東警告我不得在晚上十點以後會客，我跟貝萊克談及這事，他就找了個朋友，爲我找到了一間房間。我的新窩離貝萊克的住所不遠，從此我就開始經常去拜訪他。很快他就拉我去賣報紙，分發小冊子和參加示威游行。我發現這些活動很有刺激性，當一個「貝萊克的小伙子」倒是頗有名氣的，因爲移民局和M·I·5會將你編入特別檔案，我的朋友也對我有了一種

新的敬意。

當貝萊克第一次向我提到獎學金，我回家後興奮得一晚都睡不着覺，在很多方面來說，我也是個不明不白的人，我的父親是圭亞那一個叫亞格利哥拉的村子的造船工人，他曾一點一點積蓄起足夠的錢，供我讀完高中。我長成爲一個有很大抱負的年青人，但却缺少錢財去實現這些抱負。因此我十九歲來到了倫敦，身無分文，但滿腦子希望，狼吞虎嚥地讀了不少書，但對於我所生活的現實世界，却缺乏真正的理解。

「俄國人和東德人給予從英屬圭亞那來的學生獎學金，」貝萊克說：「我想你會有興趣吧？」

「我已經耽誤了六年學習了，同志，能夠有書讀我哪兒都願去的。」

我曾看到過貝萊克寫回本國黨主席的那封推薦信，它是這樣說的：

「祖瑟夫·羅伯遜，現年二十五歲，工人的兒子，父親是狄瑪拉格河東岸亞格利哥拉村的一個造船工人，他已具備普通教育的畢業證書，英語、經濟和歷史都是A級水準，但政治教育的水平是低的，不過在莫斯科學習將能矯正這種缺憾。他有勤學的能力，他不是一個黨員，一兩年內，準會參加的……」

我們下午在莫斯科機場着陸了，外面在下着雨。在我們旅途中，飛機曾在雲團中撕裂了一些縫隙，我瞥見了一些農村和小城鎮，在俄羅斯平原的海洋上就像一些小島似的。不過由於莫斯科被九月溫暖的雨水所掩蔽，除了灰色的影子和像史前的怪獸似的建築物外，就什麼也看不到了。我們很快就辦好了查關驗照的手續，站立在候機室中，才開始領悟到原來沒人來接我們飛機。在離開倫敦前，貝萊克會跟我去過蘇聯大使館，一個滿臉笑容的官員會說過：

「你不用担心的，有人會在機場接你，給你每個月的生活津貼費，供應你衣物，膳宿……一切你需要的東西。」

我們到處向人打聽有沒有人會講英語，但那些官員們都對我們的困境馬虎應付，漠不關心。我們又餓又累，雖然我們的熱情並沒有降低，但被困在機場的打擊，又加上言語不通，使我覺得很不愉快。不過，我還是告訴其他那三個學生說，俄國人一定是搞錯了，蘇聯大使館的那個人一定弄錯了。我覺得我應該為俄國兄弟抱歉，因為那些非洲學生都在大發牢騷，其中一個甚至說想搭下一班機飛回倫敦去。雨連續在下着，機場顯得很單調，而且人都走光了。我們互相靠着站在又空又大的休息室中央，如果不是有一個巴士（公共汽車）司機走過來，問我們要到什麼地方去的話，我們將會永遠站在那兒呢。我們告訴他說，我們是留學生，但沒有人來接機。他聽了聳肩，就像這樣的事已司空見慣似的。他說願意幫忙把我們送到大學宿舍去。這巴士（公共汽車）司機是個非常活躍的有着黝黑皮膚的人，每逢他一講話，兩隻又大又黑的眼睛就好像變得更大起來。他的英語說得結結巴巴，他的話你是聽懂不了多少，但從他臉部的表情和那雙粗壯有力的手的姿態，你會明白他要表達的意思的。

我們離開了機場，駛過寬闊的列寧斯基林蔭道，兩旁都是新建的住宅區，一路上可以看到有巴士（公共汽車）站，那是一些玻璃蓋的小屋，人們擠在裏面就好像溫室裏的植物似的。路兩旁都種植着一些幼樹，樹葉早已變了顏色，在迷濛的雨中根本分辨不清。那位脾氣好又喜歡講話的司機將我們送到查爾齊姆斯基宿舍，這是成排的新建築物，外國留學生在進莫斯科、列寧格勒、基輔、敖德薩的大學之前，都先在這兒學習俄語。他對看門的門房講了我們的情況，然後給我們

全部握過手，用他最拿手的英語說：「Very good, very good, O. K.」。那門房把我們收留下來，却讓我們站在會客室裏等待，過了一會，他帶了一個舍監回來，那是一個年邁的婦女，會講多些英語，但同樣是很不易聽得懂的。

「我們對你們一無所知。」她說：「沒有人通知我們有關你們到來的事。」

「不過，我們已經來了。」我說：「我們是從倫敦來的。」

「我們對你們的情況一點都不知道。」她憂心忡忡地重複說。

「你不知道，難道就要把我們打進地獄去嗎？」費力士生氣地說，他是一個非洲學生，他肚子餓得厲害，脾氣壞極了，幸好她聽不懂他的話。

「你們當中一個得交出護照來，」她說，「到後天你們才能見校長。今天是星期六，所有人都下班去了。」

我們幾個抽籤，結果是我得將護照交出。我把護照交出，就覺得好像給人脫光了衣服，身無寸縷似的。沒有了護照，我又怎樣能證明我的身份呢！我可以叫他們跟貝萊克或倫敦蘇聯大使館聯系，但那得花時間呀！就算我告訴他們我熱愛蘇聯，但如果沒有護照證明我的身份，那就任我講到面青口唇白，他們也不會相信的。

「請你別丟了我的護照，」我說，她聽了微微一笑，理解到我的恐懼。

「那沒問題的。」她說。

她把我們帶到樓上一間又窄又長的房間，房內有四張床，一面窗口，一個衣櫥，一個書架。

費力士說：「我們打早上起，至今沒吃過一點東西呢！」

那老婦人猶豫了一會後，走了，過了十分鐘，她拿了兩個黑麵包回來。

「明天一切都會好起來的。」我安慰着自己，就像一個人在黑夜裏吹口哨來壯壯自己的胆一樣。然後，我轉過身來對那三個非洲學生說：「爲什麼他們會迎接我們呢……只因爲我們是黑人嗎？他們有三千個從世界各地來的學生，如果每一次有學生來，他們就派個銅樂隊去……」

勃洛克是一個南非人，他平日不大講話，但他一開口講話，總是一語驚人，有些引起人興趣的東西的。他說：

「我不在乎銅樂隊，真正的問題是我們連一個銅子兒都沒有呀。」

「大使館那人說我們根本不需要什麼錢，有人會在這兒接我們，給我們每月費用的。」

「我們早該了解清楚些，」勃洛克說：「還記得培根關於旅行的散文嗎？」

「哪個培根？」利耶沙人阿賓問道：「在布蘭特利有一個叫化子叫培根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他參加作戰反對德國人的。」

「哲學家法蘭西斯·培根，」勃洛克耐心地說：「他說當你旅行的時候，你第一件需要的東西，是『國家流通貨幣』。」

「喂，但這是俄國啊，」我吹牛說，「培根不知道蘇維埃俄羅斯的任何事情，這國家再過十年就吃飯不要錢哩。」

「現在也是不要錢哩，」勃洛克神秘地說，一邊吐出一塊咬不開的麵包皮，「看吧，如果我們自己有盧布，我們就能到餐館吃一頓飽飯了。」

「一個盧布有多少價值？」阿賓問道。

「等我手中拿到一些，那我就會去找出它的價值了。」勃洛克說。

「你們知道我爲什麼會到這兒來嗎？」費力士問道，他是從烏干達來的，長着一個瘦削窄長的面孔，個子又高又瘦，當他笑時，在他那黑色的面孔上那副牙齒就像雪一樣白。「我什麼東西都試過了，我找出最適合我的工作就是當總理。不過，我首先是來學習電氣機械的。」

「等他們肯讓你學的話再說吧。」勃洛克說。

「你這話是啥意思？等他們肯讓我學？他們給了我一份獎學金，難道不是嗎？」

「不過他們至今還不知道我們到來，他們又怎麼會知道你想學什麼呢？」勃洛克說。

「我真羨慕你們還有心思談論學這學那，首先是得他們承認我們是在這裏，其次我們得學習他們的語言，在機場我會試過去聽他們那些人談話，他們講的我連一個單字也不明白呢。」

一個印度學生敲了敲門，走了進來。

「我的名字叫穆凱志，」他說，「我看到你們到步的……想想有沒有什麼事用得着我幫忙嗎？」他的氣色灰中泛青，就像一個長期不見陽光的人似的，走起路來就像混身沒有骨頭一樣。

我們異口同聲向他打聽同樣一個問題：他認識不認識任何一個我們在莫斯科的同鄉。他問我們是從哪個國家來的，我們都告訴了他。他說他認得幾個從英屬圭亞那來的學生，他會去看看他們有沒有人留在宿舍房間裏的。

「想辦法找點東西給我們吃吧。」費力士說。

「我盡快給你們弄些雞蛋來。」穆凱志說。

當晚再夜點，一個英屬圭亞那來的黑人學生馬爾柯姆·凱爾沙來探望我們。他帶來了一些糞

熟的雞蛋和乳酪，我們對他問了好多問題。在到莫斯科來學醫前，馬爾柯姆在圭亞那做過公務員，我在倫敦會見過他的弟弟，在他回答我們任何問題之前，他先走到門邊去，前後上下望了走廊一番。

「我不信任穆凱志，官方給錢叫他監視新來的人的。」

這話聽來如此荒謬，我忍不住大笑起來，但馬爾柯姆却仍舊很嚴肅。

我問道：「你這是開玩笑，還是怎的？」

「在這兒可不是開玩笑的，」他說：「我在這兒已經兩年了，快別嘻嘻哈哈，認真聽聽我告訴你的事吧。他們一將你安排到一個房間去住宿，你就會有一個俄國人成天跟你在一塊，那你就連自由行動的機會都沒有了。」

他在對我滿腔的熱情大潑冷水，令我感到十分不痛快。

「人家給你獎學金，可你却這樣議論他們嗎？喂，你們這樣未免太忘恩負義啦。」我憤慨地說。

「我是說我該說的話，然後讓你們自己獨立思考……你們走運，在初到第一晚就有人來提醒你們。我可得自己經過千辛萬苦才找出這些道理來的呢。」

馬爾柯姆有紅棕色的皮膚，一頭亞麻色的卷髮，突出的大眼睛。但他身上有一種威嚴，使他看上去比他二十五歲的實際年齡要老氣得多。

「那麼我們就聽你談談吧。」勃洛克說。馬爾柯姆也能意識到我們四個對他不懷好感，但他却像個老師循循善誘對待不聰明的學生似的在幫助我們。